

凤凰涅槃

卢延风

2018. 11

狮城

小引

从科大时期开始，中国现代性问题就一直跟随着我。在博士论文中我对现代性做了较系统深入的讨论。此后，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大课题。这个系列的文章描绘我目前对中国现代性的一些总体构想。作为总体构想，它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素描。其中的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具体化。我是学西方哲学出身，对中国哲学的研习起步较晚。所以，相比起来我对西方的部分更加确信，而中国哲学的部分正在努力探索中。在对细节具体化之前，一些总体构想还是愿意拿出来与朋友们分享和讨论。

凤凰涅槃意指西方 Phoenix 的传说。Phoenix 几百年会在烈火中重生，生命不息。中国的凤凰与 Phoenix 很可能不是同一个事物，却是最近的翻译。“涅槃”是佛教的观念，指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所以与重生似乎恰恰相反。然而，在轮回中求永生又的确是一种超越，中国意义上的超越。不管怎样，在现代汉语中“凤凰涅槃”已经成为 Phoenix 传说的最好翻译。

第一章 物极必反：国学热的来龙去脉

世纪之初在大陆兴起的国学热目前还在升温。从企业到机关再到学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被冷落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阅读中华典籍蔚然成风。各种国学讲座和纪念活动层出不穷。据说国学已经与英语和奥数一起成为家长比拼孩子的一个核心科目。

直观上看，国学热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的必然结果。当中华民族慢慢恢复原有自信之后，自然会关注到文化认同问题。在这方面人们不可能不回头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而在文化的深层我们看到的是，当前中国的国学热标示着中华文化在受到西方现代性冲击之下，严重偏离原先轨道之后，开始在回转。

然而问题是，中华文化重新回到冲击之前的轨道已不合实际。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它在吸收了冲击之后，在一个经过调整了的新轨道上运行。这个新轨道应该保持原先的总体方向，而不是沿着冲击的方向。但另一方面，这个新轨道又要能把中华文化所受的冲击融合在其中。

为了对国学热做比较深入的分析，我们首先需要在哲学文化层面上，对西方现代性冲击之下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做一番回顾。我们将从冲击发生的前夜开始。

一、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开端（1840）

十八世纪乾隆治下的中国，在康熙奋力开拓和雍正精明治理的基业之上，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此时西方现代化过程已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越过了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们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已经发起，并且在火热进行中。所有西方的这些重大变革，都未曾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冲击，尽管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早已发生。

长期以来，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扮演着中西方文化传播媒介的角色。他们带来了西方不同时期的思想和物件，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当时西方对中国所采取的是崇尚的态度。许多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乾隆的宫廷，对其中的精致与奢华大为震惊和赞赏。

在西方，先有莱布尼兹对《易经》中二进制的痴迷。而伏尔泰则直接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为范例，来抨击路易十四的暴政。在当时作为欧洲中心的巴黎，甚至曾短暂地刮起一阵强劲的“中国风”。一时间许多仿照中国的建筑和家具被建造出来。相比之下，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东西基本上只被当作摆设和玩具。他们为乾隆建造了西式园林，带来了机械钟表。但是中国的宫廷中早已有自己的计时方法，更夫并没有参照机械钟表来打更。



François Boucher: Le Jardin Chinois

这是一幅十八世纪法国画家所作罗可可风格的作品。画作的名称为“中国花园”，其中中国的元素非常明显。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总体上采取的是崇尚的态度。（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进入十九世纪，中西方之间的和平友善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源头当然还是在西方。

一方面，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告一个段落。许多由蒸汽机驱动的自动机器被发明制造出来。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蒸汽船。它为西方的海上扩张奠定了新的技术基础。西方人急迫地想到中国来做生意，但遇到的却是清朝的海禁政策。广州是当时唯一的中西方通商口岸。中国的大批货物，包括丝绸、瓷器和茶叶由此销往西方。然而直到此时，西方能够卖给中国的东西却还是屈指可数。这最终导致中西方贸易大量的顺差。

另一方面，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变革。与路易十四的暴政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曾显得很开明。但是此时西方人已经开始用一种鄙视的目光来看待中国的封建体制。以前西方人到清廷参见皇帝，都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此时再让他们这么做，他们已非常不情愿。

这种新的经济政治格局使得中西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针对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想出了一个卑鄙的手段——贩卖毒品。一时间大批的鸦片从广州涌入中国市场。很快大量国民吸毒成瘾。道光的软弱和优柔给了英国人可乘之机。最后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终于在1839年，道光任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把英国商人的一千多吨鸦片当众销毁。英国由此向中国宣战。这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历史学家把鸦片战争的起点定在1840年。实际上在1839年中英之间就在香港开始交火。英国的大规模远征军于1840年6月抵达广州。起先他们封锁了广州，而后北上强迫清政府谈判。大规模的交火发生在1841和1842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

奈米西斯号（Nemesis，图中右后方）是英国的第一艘海上铁甲战舰，由帆和蒸汽机两种方式驱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多艘中国的大型木制炮舰不是它的对手。在战争中，中国人首次体验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从此不得不正视西方的崛起。（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第一次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清军在战争中的惨败明显地暴露出中国的落后和虚弱。西方列强见势乘虚而入，让清军连吃败仗。而对于中国来说，她再也不能无视西方的崛起。中华文化被迫走上了应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道路。

二、应对的第一阶段：军事、经济、政治（1861-1912）

面对西方列强的凌辱，清朝的士大夫们并没有消极待毙。谈判时劣势地位中的周旋力争之外，是民族的自强运动。早期**洋务运动**的核心是军事领域。许多军工厂在不同地方建立起来。西方的专家被请进来，自己的人员被送出国培训。很快使用新式武器的陆军和水师被组建起来。到了后期，洋务运动扩展到民用工业，包括开矿山、修铁路、架设电报线等。这实质上开启了中国的工业革命。然而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利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日本推行同样的洋务运动起步相对还晚一些，却最终胜出。中国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开始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国吃了西方列强的败仗之后开始努力向西方学习。如今吃了日本的败仗又极力向日本看齐。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公车上书。三年之后光绪终于接受请求开始变法。然而**变法运动**只进行了103天便被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变革的希望已化为灰烬，大清帝国走上了穷途末路。

有历史学家指出，慈禧从一开始就知晓变法运动，并且采取默许的态度。只是随着变法的发展，一些保守势力的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慈禧感到自身受到威胁之时，才决定终止变法运动。结果所有变法项目中只有一条被保留下来，即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

被逼无奈，1905 年慈禧自己派出使团到西方和日本去访问考察。使团回国之后建议中国以日本为模范实施立宪运动。然而这些补救措施为时已晚。



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内军械所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于 1861 年设立，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军工场。它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端。军械所任用清一色的中国科技人员，在没有洋人的帮助下，自主研发出中国的首台蒸汽机和首艘蒸汽轮船。

与在位的士大夫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准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同，中国东南部的下层农民和渔民对清政府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许多人在本地难以维持生计，被迫背井离乡、流亡海外，构成了中国海外移民的主体。到了十九世纪末他们已经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孙文就是其中的一员。当他提出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后，很快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而海外华人是革命思想的积极支持者。随着革命思想影响力的扩大，起初的刺杀破坏行动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推翻。

1840 年中华文化首次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之后，在二十年时间里接连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屈辱。在逼迫之下中国开始了应对冲击的努力。在短短的五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阶段的变革主要发生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国应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基本原则是向西方学习。在军事上引入了西方现代的武器装备。在经济上开启了工业革命和民族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帝制，开创了共和政体。

在此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没有被触动，总体上被保留下来。洋务运动只是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中国的社会文化依然如故。百日维新是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进行的。孙文的三民主义借鉴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渗透在其中。

三、应对的第二阶段：文化（1915- ）

在西方五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大约前一半时间都是在思想上做准备工作。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的经济政治领域大体上仍保持着传统的状态。只有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西方的传统社会才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总的来说，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先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经历了很长时期之后才依次波及到经济和政治领域。这是一种自发的现代化过程。

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之下被迫进行的。迫切的局势使得中国没有做任何思想上的准备，便开始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这些变革没有与传统思想文化磨合的机会。它们的动力只是来自“落后就会挨打”的现实需要。

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对阵中，中国人明显看到了自己武器装备的落后。在洋务运动中，中国人体验到了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在中国被日本赶超，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之后，中国人又强烈意识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这种复杂的受辱情结最终扩展到了思想文化领域。于是中华文化走上了全面的自我否定。这种情结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在此之后它又被一再地巩固，以至于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挥之不去。

多方的因素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辛亥革命和清帝退位之后，政治局势略趋平稳，人们有机会思考一些深入的问题。其次，由于严复的大量翻译，在现代科技之外，国人对西方的哲学社会思想有了深入了解。再次，一批海外留学归来，通晓西方文化的学者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新文化运动把前一阶段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延续到了文化领域。其基调与前一阶段一脉相承。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在文化上和其他领域一样落后，中国在文化上同样应该向西方看齐。一方面，传统的文言文被极力地抛弃，并逐渐被受西方语言影响的白话文所取代。同时中国传统哲学被批得体无完肤。另一方面，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被奉若神明。

在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中，还是有人站出来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他们是在对抗时代的潮流。**科玄论战**可以看作是当时中国文化状况的一个窗口。论战显然以科派的压倒优势而告终。胆敢对科学指手画脚的人最终被带上了“玄学鬼”的帽子。

新文化运动定下了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基调。此后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看到的是，经济领域中超英赶美的努力，文化领域中科学主义的盛行，以及政治领域中对西方民主的进一步诉求。中国传统文化再一次被更加彻底地否定。捍卫传统文化的努力只是在海外被零星地承继着。



《新青年》创刊号

陈独秀 1915 年在上海创立《新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它同时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为特征。陈独秀是安庆人。中国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与安庆有不解之缘。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安庆为安徽省省会。（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四、反者道之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军事上正不断地缩小与西方强国的差距，在经济上超英赶美的目标也已进入视线之中。当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耻辱被逐步洗雪之时，中国人又开始对久违了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正是在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之后，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抛开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精神无法维系。这正是国学热的深层文化基础。

然而，当前的国学热显然是遇到了一个深层的问题。在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社会经由现代化已经远离了传统社会。这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要重新拿回来的传统文化却基本上还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传统文化。总的来说，中华文化还没有机会得到很好的现代化。这主要取决于由屈辱带来的，对传统文化自我否定的主流态度。

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方面，现代新儒家的工作算是最有意义的了。它代表着最具影响力的非主流声音。然而，现代新儒家却基本上运作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之中。它基本上以不加批判的西方现代性为前提，然后去阐释儒家的意义。它或者极力去论证儒家之中也蕴涵着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或者努力去证明儒家的价值观念可以解决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明显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国学热中的一些活动基本上是流于形式。穿古装，行古礼，读古籍，固然可以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但是如果不去做好基础的思想理论工作，不去完成西方自身花了两个半世纪所完成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工作，这些都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毕竟中国不可

能再回到 1840 年以前。现代新儒家在国学热中受到了明显的重视，但是由于理论局限性它似乎只是把儒家思想变成了一包现代社会的心理安慰剂，一锅“心灵鸡汤”。



国学热

不管当前的国学热到底含有多少实质内容，中国人重新开始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已构成一种文化现象。这可以看作是对长期传统文化自我否定的逆转。（图片来源：网络图片取自 k.sina.cn）

我个人的心路历程与中华民族现代的心路历程产生了共鸣。在三十年时间里，我的思想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我们当时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下受教育。我进初中不久就认准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于科大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紧密关系，科大当时被看作中国科学家的摇篮。高中时期我对物理学和爱因斯坦产生了痴迷，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念。有趣的是，我在科大读书期间对科学主义开始产生怀疑。等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基本上完成了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变。我的第二个思想转变则是进一步由西方的人文主义回归到中国的人文主义。更有趣的是，这第二个转变是在旅美期间完成的。

在这个思想历程中我感到从时代的蒙蔽中走了出来。在这段戏剧性的思想历程之后，我开始深入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课题。其间我特意对变革后的中国、欧洲和新加坡做了深入的体验和思考。现在我明确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再次复兴在于中国现代性的建立，而这也以超出时代的蒙蔽为前提。

第二章 深层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性的综合

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性的剧烈冲击之下，做出了戏剧性的应对。与西方长期自发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外力的逼迫之下，被动进行的。在西方，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思想变革之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才开始了实质性的变革，而且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也是逐步展开的。而在中国，社会变革的顺序总体上是颠倒过来。

经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屈辱之后，中国先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变革。在半个世纪里，中国开启了工业革命，创建了民族资本主义，最后结束了封建帝制。外来的屈辱在中华民族心理中形成了深深的**受辱情节**。与受辱情节相随的**基本信念**是：屈辱由于中国落后，而为了雪耻就必须奋力追赶。

所以当中国的变革最后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时，这种基本信念也很自然地扩展到思想文化。于是在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不久，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文化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的态度主导了二十世纪整个的中华文化。当然，在主流之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即使是对中华传统情有独钟的人，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也只能采取被动辩护的态度。他们总体上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之中努力去找寻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以这仍然是运作于上述的基本信念之下。

这个基本信念使得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被延误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发现，中华文化仍然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究其原因，中华文化还没有机会很好地现代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西方也不是一百年前的西方。已经到了我们该走出受辱情结和与其相对应的基本信念的时候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性做新的反思。只有这样，被延误已久的中国现代性课题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一、深层文化视野

西方现代性的剧烈冲击导致中国人在应对冲击之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表层文化上。最一开始，中国人看到的只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进一步人们开始意识到，作为船坚炮利后盾的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再进一步人们又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需要自由的政治环境。直到最后，中国人才关注到西方的科学思想、哲学、宗教和艺术。

在表层文化上，从军事到经济政治，再到科学，传统的中国社会与现代的西方社会比起来，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正是现代化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主流中，

这种表层文化的中西对比被简单地延伸到深层文化。于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方方面面都是落后的。

这种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明显优劣对比，隐含着**与事实相悖的三个基本假设**：

1. 与西方社会在近现代的不断变革相比，**中国社会历来都是一陈不变、停滞不前的**。与其相应的是闭关锁国、思想保守的中国。但是我们只要了解一些世界历史就会知道，没有哪个一陈不变的文明可以延续几千年时间。历史上存活比较长久的文明，都免不了要对新的历史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文明的衰亡都是由于不能很好地应对历史新形势的结果。我们在中国历史中看到的是一个朝代的兴衰。但这不是朝代更替的死循环。在这个兴衰的循环中，中华文化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我们可以把这看作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2. **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对比被径直地混同于中西文化的对比**。在先进又强大的现代西方社会面前，人们忘记了在此之前西方曾有一个漫长的、蛮荒的历史时期。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西方传统社会在方方面面就像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相比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是国家实力的象征。而中国长期以来人口都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按照现代 GDP 的算法，中国在多个世纪中排在世界 GDP 的首位。在近代，这一地位只是到十九世纪末才被美国取代。此外，西方在科学技术、政治体制、社会管理、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曾落后许多。

3. 当人们意识到西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时，又主张**西方现代社会是与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在很长时期里，西方把传统的中世纪贴上“黑暗世纪”（The Dark Ages）的标签，仿佛现代社会是在魔法棒的一挥之下神奇地产生的。但事实上，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即便到了现代性的发展成熟阶段，它也不是与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对西方现代性做深入的解析，就会看到其中包含着许多基督教文化的烙印。参照西方的上述观点，许多中国人也相信，**中国的现代化也应是与自己传统的彻底决裂**。

为了走出上述与中国近现代的受辱情节相伴的狭隘观念，我们需要一个**大文明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人类两大文明之间的对阵**。为了获得这个视野，我们不仅需要超越近现代，对人类历史有一个全局的把握，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深入到两大文明的核心，抵达文化的深层。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文化的表层，停留在军事、经济、政治，甚至科技的层面，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是西化，甚至是全盘西化。在这些文化的表层，中国要想现代化，似乎就只能是照着西方去做。全盘西化连日本人都甘心，就更不用说曾经长期领导过世界的中华文化了。

四大文明	总体描述	宗教	外来文明影响
华夏文明	现今保存最完好的人类古文明。远离其他主要古文明，后期也未曾受到其他主要文明统治。具有很大独立性。	以儒家和道家为核心的人文主义	古巴比伦文字、技术等，印度佛教，西方现代性
印度文明	人类主要古文明之一，同样具有很大连续性。但曾受到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长期统治。	印度教、佛教	伊斯兰教，西方现代性
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西方曾受到伊斯兰文明的征服，与其有深层文化冲突。	古希腊罗马神话、基督教	基督教
伊斯兰文明	最年轻的现存主要文明。曾扮演过保留古希腊罗马文明和中西方文明媒介的角色。	伊斯兰教	古希腊罗马文明

现今人类四大文明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怎样去延续中国的文化传统？答案是我们必须回到深层文化，回到文化的核心，回到宗教、哲学和艺术。所以大文明的视野也是**深层文化视野**。民族和文明的独特性在深层文化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旦我们获得了深层文化视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保持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西方现代性中也处处打着西方文化的烙印。

二、中国的还是传统的

中国现代性，顾名思义，应该是中国性和现代性的综合体。其中的中国性显然只能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提取。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抛在一边，即使是我们实现了现代化，最终得到的也不可能是中国现代性。而这里所说的提取是要在中华文化中分离出、辨识出其核心成分。这些成分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这些成分是中华民族保持其本性的东西。

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华民族只有保持住这些东西，才能保持自身的认同。这些中华文化中的核心成分正是中国性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些核心成分之外的东西都是可以进行变革的。现代化无疑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加以变革。这些成分是不合时宜的东西，或可以与现代的东西相对被称为传统的东西。

自从中国在西方现代性的剧烈冲击下开始认真地去应对它，文化精英们就在努力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某种结合点。最早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其核心思想是引入现代科技，发起工业革命，但是同时保持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体制不变。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则进一步要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加以改造。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是“百日维新”的范本。孙文的“**三民主义**”融入了更多西方民主的思想成分。

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哲学开始受到批判。文化精英们以谈论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为时尚。这使得仍然试图捍卫传统文化的学者们顿时处于守势。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大势力面前，**现代新儒家**也大都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它总体上运作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夹缝中求生存。

李泽厚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主要取决于其美学的视角。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只能是与主导的西方“社会性公德”相对的“宗教性私德”。换句话说，传统文化只能在主体的西方现代社会中起到“**范导作用**”。最初的“中体西用”最后变成了“**西体中用**”。

思想流派	代表人物	基本立场和观点
中体西用	张之洞	保留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引进西方的现代技术并开展工业革命。
托古改制	康有为	保留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以日本为范本实施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
三民主义	孙文	保留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创建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典范的共和政体。
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 胡适等	抛弃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观念体系和社会政治体制，全方位向现代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看齐。
现代新儒家	张君勱 冯友兰等	捍卫中国传统思想价值体系，但对西方现代性总体上持不批判的态度。
西体中用	李泽厚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限制在西方现代大机器的主体之外，而对大机器的本身并不做深层批判解析。

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代表性思想

在中华文化应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心路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性的谱系**。中国性由“祖宗之法不可变”口号下的一整套思想价值体系和经济政治体制，演变为需要加以辩护的哲学思想体系，进一步演变为零散的思想观点。这些零散的观点只不过是西方现代社会主体之上的一些点缀而已。就拿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来说，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实质上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加上儒家只不过是一个点缀。四小龙崛起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儒家的价值观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关键。

在这个谱系的两头显然都是很极端的情况。一端是盲目复古，另一端是全盘西化。如果我们不能在谱系的中间建起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我们就只能在两极之间不断徘徊。由此，**认清中国性就成为中国现代性课题的第一要务**。

三、西方的还是现代的

与含混的中国性对应的是含混的现代性。一提到现代性，人们自然会想到科学、民主、资本主义和商业主义，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性。现代性成了西方现代性的简称。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西方现代性中西方的成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把传统社会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认为现代社会是与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于是西方现代性变成了普适的，新的人类发展阶段。西方现代性在全球垄断地位的确立，迫使人们不加质疑地去接受这种普适性。任何一个传统文化要走上现代化，除了效仿西方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在西方现代性中区分出西方的和现代的成分，是中国现代性课题的第二要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中滤除西方的成分，才可能有中国性和现代性的完美结合。否则我们得到的只能是，西方现代性加中国的点缀。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现代性中潜藏的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资本主义和商业主义到现代科技，再到民主政治。在一个个危机面前，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西方现代性的普适性。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浪潮也使人们更容易把西方现代性置入一个多元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在这个大背景之上，西方现代性的一些潜在的前提假设被揭示出来。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在西方现代性中被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

在这篇总述的文章里，我们不可能深入细节。这里只能对西方文化的继承性做简略的讨论。**西方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与传统基督教文化有着明显的关联。**

现代科学寻求现象背后的普遍定律，并且努力把各种不同的定律还原为某些基础的定律。**科学主义者**坚信宇宙大一统理论最终能够实现，并且它可以用来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这种普遍基础观念实际上是全能上帝观念在现代的蜕变产物。在别处我们曾提过，这是一种镜像蜕变，即从精神本源蜕变为物质本源。

宇宙论中的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具体到人类社会就变成**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信念是，社会可以还原为个人。这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按照自由资本主义，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其最终结果将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这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契约论**。按照契约论，政治共同体通过个人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

进一步，西方现代性中的个人又是非常抽象的，因而是平等的。许多传统的个人属性，诸如出生、年龄、性别、种族、学识和修养都被淡化。取而代之被强调的是普遍的理性、金钱和抽象的个人意志。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在文化领域，理性和效率主导一切。理性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其他属性，有理性的人统治。在经济领域，金钱主导一切。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其他属

性，有钱的人统治。在政治领域，个人意志主导一切。每个人的意志平等，不论其他属性，获得最多选票的人统治。

这种抽象个人基础之上的**平等主义**，似乎也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文化中的人的观念。在上帝面前人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看护的孩子。本来个人的人间属性就是不重要的。宗教改革之后，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人们在上帝面前就更是平等的。

社会领域	基本思想体制	普遍平等标准	基本信念
文化领域	科学主义、启蒙思想	理性	理性是人类最高贵的属性。人类生活应遵从理性的原则。理性最终被简化为实证理性。
经济领域	自由资本主义、商业主义	金钱	金钱是经济的唯一标准。生产以利润为目的，以市场为手段。
政治领域	契约论、民主制度	抽象个人意志	政治权利的基础是抽象的个人意志。这种意志不受其他个人属性的影响。

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在西方现代性中的表现

揭示出西方现代性中西方的成分，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性只对西方文明有意义。**如果说西方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不具有普适性，那么其中仍然包含着普适的成分。**现代科学技术就是很好的例子。现代科学虽然具有局限性，但它无疑提供了一个关于物质世界的卓有成效的观念体系。在这个观念体系中，现代技术则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活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由于人类共享着同一个物质环境，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这个新的物质平台显然对人类具有普适性。除此之外，别的文化领域并不是如此直截了当。在其中区分出西方性和现代性则需要深入的理论工作。

四、中国性与现代性的深层有机综合

中国性与现代性深层综合的前提是对中国性和现代性的准确界定。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区分中国的成分与传统的成分；其二，在西方现代性中区分西方的成分和现代的成分。这两项基本任务完成得不好，我们就不可能有中国性和现代性的深层综合。

“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是两个极好的例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念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区分好中国的和传统的成分。“中体”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西用”是现代科技加工业。在这样一种体用关系中，西方现代的东西只是被拿来当作一个工具。李泽厚的

“西体中用”观念则没有在西方现代性中区分西方的和现代的成分。“西体”基本上是西方现代性的全部。“中用”是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在这样一种体用关系中，中国传统的东西只是现代大机器的填充剂和润滑剂。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不到中国性和现代性的深层综合。

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假洋鬼子”的人物形象。假洋鬼子身穿西服，却仍然留着个大辫子。像假洋鬼子这样的中西文化奇异混合产物，直到现在仍屡见不鲜。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一方面把美国骂的狗血喷头，但另一方面却恨不得把全家都送到美国去。而另一些人比照着西方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但另一方面如果问他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里，不清楚把自己往哪放。

在目前盛行的国学热中，我们也处处可见中国性和现代性的简单掺和物。一些人在现代社会的熙攘忙碌中不堪重负，挤出一点时间来参加读经活动。活动结束后，生活依旧。这里中国传统文化被当成了休闲娱乐的内容，最多是一碗心灵鸡汤。刚喝下去那会儿很轻松，不过只是那么一小会儿的感觉而已。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孩子穿上“汉服”，摇头晃脑地诵读《弟子规》和《三字经》。此项活动结束后又忙着去赶奥数 and 别的补习班。这里中国传统文化只是被当成了时髦的形式。传统教育育人的核心早已被功利的技艺取代。



现代企业国学培训

中国性和现代性的综合不仅应是深层的综合，而且应是有机的综合。当我们准确地界定了中国性和现代性之后，我们不能只是把两者直接混合在一起。中国现代性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成分和现代的成分不能再相互抵触，格格不入。相反，两者应该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在理想情况下两者的综合体应能包容两者，但同时又能超出两者之和。

带着对中国现代性的这些总体设想，我们就可以深入到其中的具体问题。

第三章 冲击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发生性解构

西方现代性的萌芽和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事。在短短几个世纪之中，它不但彻底改观了其发源地——西欧，而且其影响力迅速波及地球的各个角落，在近期甚至延伸到太空。它使得在传统社会中相对落后的西欧，一夜之间变成世界霸主。而传统社会中的区域性强国在与西欧的较量中都一个一个败下阵来。西欧列强不断向外扩张，一路之上把六大洲都变成了殖民地。最后，连远在东方，长期强盛的中国也未能幸免。

在西欧的强大阵势面前，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不得不做出应对。力量小的文化只得屈服，甘愿被西方同化。力量强大的文化显然不愿甘拜下风。西方现代性为中国带来的是双倍的屈辱。长期以来中华文化独霸一方。在乾隆治下，西方人到中国还是心悦诚服，俯首下跪。几十年之后，中国竟然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日本使中国人的受辱情结更是雪上加霜。日本曾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阴影之中。最后它居然后来居上，迅速赶超中国，并且给中国带来了比西方列强加在一起还要多的耻辱。这口气怎么能咽下去？没错，到现在还憋着呢。

正是这种受辱情结和这口气，使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乱了方寸。有人盲目地拒斥西方现代文明，空泛地死守着往日的至尊；相反，有人又把中国传统文化批得体无完肤，把西方的文化奉若神明。更使人困惑的是，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可以被一些人同时持有。有人可以在享用西方现代成果的同时大骂西方国家。有人又可以在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决裂的同时，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所有这些矛盾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由自主的。深究起来，主要是受辱情结在作怪。

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该到走出受辱情结的时候了。走出受辱情结的关键在于，能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去看待西方现代文明。而这又建立在精准地把握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之上。

一、发生性方法

所谓发生性方法是通过研究一个事物的产生过程来揭示它的特性的方法。在生物学领域，胚胎学运用的就是发生性方法。胚胎学研究生物胚胎的发育过程，从中人们可以揭示出物种的一些特殊属性。在心理学领域则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它研究儿童的心理发育过程，从中人们也可以发现人类认知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类似的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到对西方现代性的研究中。



皮亚杰对儿童心理的研究

皮亚杰通过研究不同成长阶段中儿童的认知特性，揭示了人类认知发展的一些总体规律。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对于成人的心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这种对事物成长过程进行研究的**发生性方法**具有广泛的意义。它可以用在许多其他的领域。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的认识趋于**模式化和固定化**。

首先，当中国人在西方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下开始正视它的时候，它已经发展得几近成熟。这时中国人看到的西方现代性已经与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有了很大区别。它的漫长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中国人的关注。所以中国人在比较中国与西方时，总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发展成熟了的西方现代性加以对比。

其次，五四时期形成的关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长期保持不变。在二十世纪中，西方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取得了长足发展。一些原有的观念得到了修正，如科学观念。在批判的基础上，西方针对社会中的某些问题也做出了相应的变革。一个例子是环保运动的兴起。尽管有这些新的发展，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的观点还基本上停留在“五四”的水平。

从发生的角度对西方现代性加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这些片面、陈旧的观点。具体说来，发生性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如下关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

（一）发展阶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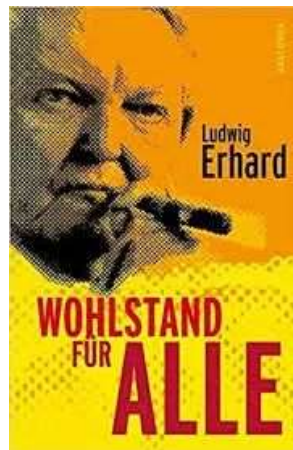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现代社会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西方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其中一些要素直到晚近才开始出现。仅举几个例子。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家产还奉行长子继承制。如果你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你就只能甘认命苦。父母去世后你基本上分不到任何遗产。男子平等权利在十九世纪的西欧已基本实现。但是女子的平等权利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仍然是女权运动努力争取的目标。与此相关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即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普选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成为现实。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成分和现代的成分在长时间内并存。总的来说，西方的现代化按照思想文化、经济技术和政治体制的顺序进行。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夜，西方的现代化还局限在思想文化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基本照旧。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社会的变革才开始迅速发展。所以有些历史学家主张，工业革命才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开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领域又滞后于经济领域。我们上面提到的，西方社会晚近的发展都属于政治领域。

（二）民族多样性

如果我们从一个发生的视角去看待西方现代性，我们又会发现，现代性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的具体实现具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个总体的比较。德国和美国都是西方发达的现代国家，但是它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有明显的差异。

在经济上，德国战后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作为自由市场经济补充的是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而美国则极力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在出现经济危机之时才被迫对经济做出相应的大幅度宏观调控。在政治上，德国有一个强力政府在管理着社会的多项事务，而美国人则历来信奉小政府，主张政府对社会应尽可能少干预。在文化上，德国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人们很少会信奉科学主义思想。而在美国，人们对现代科技则非常痴迷。男女老幼都对科幻和各种各样的机器着迷。



《全民富裕》（Anaconda Verlag 2009）

路德维希·埃尔哈特是德国战后阿登纳时期的经济部长。他在这本《全民富裕》的书中阐释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社会市场经济把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目标相结合。政府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用来避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病，其中一项就是垄断。他认为公平自由的竞争是全民富裕的保障。但另一方面，自由竞争又必须顾及社会责任。

西方现代性中存在的民族多样性提示我们，不要把西方某一个国家中的情况简单地归作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我们需要对该国的特殊历史状况有所了解，并在此背景之上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

（三）传统继承性

从目前的西方现代性出发去对照现代和传统社会，我们会觉得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仿佛西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产生了彻底的决裂。这种观念在西方曾长期是文化界的共识。中世纪被称为黯淡无光的“黑暗世纪”。它与古代和现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二十世纪，由于新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西方渐渐走出了这种偏见。

一个发生的、历史的视角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西方现代性的传统继承性。如果我们仔细追踪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中的许多要素仍然被保留在西方现代性中。尽管这些要素可能在现代采取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却保持不变。

这里我们可以简略地看一个例子。在西方启蒙的时代，理性被看作是信仰的对立面。相应地，科学和宗教被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前者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后者与落后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在中国显然也得到了普遍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现代科学的初创时期，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那么简单、模式化。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包括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莱布尼兹和牛顿，有谁不信仰上帝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不信仰上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就必然会带上基督教的烙印。

二、西方的现代化

我们考察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先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些主要事件上。西方走出传统基督教社会的动因主要在于传统社会的内部。到了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文化已经变得非常没落，教会中的腐败非常严重。有的教会甚至直接把宗教商业化，卖起了赎罪券。他们声称，只要信徒们买了赎罪券，自己的罪就可以被赎清，最后便可以进入天堂。这种情况引发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最早的两个重大事件。

文艺复兴发端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自由城邦，后来进一步传播到北方。文艺复兴以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典范，对基督教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它主张回到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其思想核心是由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围绕着上帝，而文艺复兴中的文化精英们则把注意力投到人类自身。这明显地表现在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

在文艺复兴中，人不再被看作带着原罪的、等待救赎的、卑微的上帝羔羊，而成为通过精通哲学和艺术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存在。文艺复兴的理想是一个精通多个领域的完人，而它在达·芬奇那里找到了化身。莎士比亚则通过哈姆雷特的口，道出了对人类的礼赞：人乃“宇宙之精华！万物之楷模！”



Michelangelo: *David*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Florence, Italy)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把关注重心从神移向了人。在米开朗基罗的这座《大卫》雕塑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人类的另一种礼赞。（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针对基督教的传统，文艺复兴是一条非常激进的道路。然而西方现代化走的却是一条折中的道路。的确，在上千年的基督教传统之后，彻底的人本主义让许多人难以接受。在中世纪，庞大的教会控制着宗教活动，而宗教活动又主宰着其他的社会事物，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经济上有十一税，在政治上有君权神授，在文化上则有经院哲学。正是教会的绝对权力导致了腐败和没落。

走出没落的折中道路起初体现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总的来说，**宗教改革保留了上帝和《圣经》的权威，但同时却贬低了教会的地位**。按照路德的主张，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产生联系，并不需要以教会为中介。于是信仰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与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的确是一条折中的道路。它一方面把个人从没落的教会组织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却依然保留了神本主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扫清了道路。现代科学创立的基础，正是个人精神的自由历险和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在新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大胆地构建新的世界图景。哥白尼、伽利略和培根是现代科学的开创者。哥白尼最先向基督教的地心说提出挑战。而伽利略和培根则提出了现代科学的两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数学和实验的方法。

牛顿力学是数学和实验方法的第一个巨大成果。它运用流数（微分）的方法，综合了开普勒的天体理论和伽利略的运动定律，把天体运动和地面上物体的运动统一起来。于是大到行星，小到沙粒的物体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这一崭新的世界图景对基督教旧有的世界图景构成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基督教的世界观念轻易地就被牛顿力学推翻。牛顿那个时代的人很少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和能力。如果说世界已变成一台机械钟表，那么上帝依然是那个制造钟表，而后上紧发条的工匠。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直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巨大成果之上。**居于启蒙运动核心的是对理性的极力推崇**。人类理性被赋予了“自然之光”。它可以照亮一切黑暗。启蒙的英文单词“Enlightenment”本义就是照亮的意思。这种对理性的极力推崇显然导源于现代科学的方法。数学建模和实验考证的方法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把人类从中世纪的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展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以至于对理性本身的界定都带上了现代科学的烙印。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理性使人类脱离蒙昧和盲从状态，从而变得自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就是“人类走出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就是不能在没有别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理智。”所以，**个人的自立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核心思想**。而这又与理性密切相关，因为只有理性才让人变得自立。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现代科学的创立和启蒙运动主要都是思想文化界的运动。西方社会的变革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工业革命的发端以蒸汽机和一系列自动机械的发明为标志。十八世纪晚期，瓦特对前人的蒸汽机做了大幅度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它的输出功率，并且使它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紧接着一系列由蒸汽机驱动的织布机被发明出来。英国的纺织业以此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和由它驱动的自动机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开创了现代机械化大工业。



瓦特的蒸汽机

瓦特对前人的蒸汽机做了重大改进，使它可以用于工业生产。这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而工业革命是西方走向现代社会和获得世界霸权的基础。（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在机械化大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以利润为根本目的和动力，以市场为基本手段。这便是**资本主义和商业主义**。在传统社会中，尽管商业早已出现，但是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中资本却成了经济生产的核心。经济活动的首要目的是**资本的增值**。只要能获取利润，生产什么、怎么生产都是无关紧要的。市场需求也只是一种手段。

新的经济模式需要新的社会政治体系与其相对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市场都需要有自由的个人，即自由的劳力和自由的消费者。旧有的封建专制体制下显然没有这种自由的个人。所以，在工业革命和新的经济模式形成和发展之后，**政治革命**便随之而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政治变革的开端。革命之前，王权统治社会；革命之后，王权被推翻或受到大幅度削弱。

法国大革命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然而这些社会政治理想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才逐步得到实现。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王权在西欧仍然有很大势力。美国在这方面非常特殊。你如果按照美国的历史去猜度欧洲，肯定会出现很大偏差。在西方，民主制度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普选直到二十世纪才成为现实。而人权观念在二战之后才产生广泛影响。

三、现代性的本质属性

在简要追溯了西方现代化历程之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所谓本质属性是指必要的属性。换句话说，离开了这些属性，一个社会便不能成其为现代社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些属性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样我们才能把握现代性最核心的要素。

我们研究现代性，必须以西方现代性为蓝本，因为到目前为止，西方现代性是唯一一个现代性的现实形式。现代性发源于西欧，由于其强大的力量，它已经扩展到西欧之外的广大疆域。但是如果深入审查现今所有的现代社会，就会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现代社会在核心理念上超出了西方现代性。由此，现代性的本质属性也只有到西方现代性中去提取。

由于没有现实的替代现代性作为参照，完全从西方现代性的自身去提取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在不同形式的现代性中总结出现代性的共性，然后直接把这些共性当作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这样，**寻求现代性的本质属性与构建替代现代性就成为同一项任务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虽然我们没有现实的替代现代性作为参照，但是我们在提取现代性本质属性的过程中，可以做至关重要的另外两种比较研究。首先，我们应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加以比较。依据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我们必须能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其次，西方现代性中的民族多样性又让我们可以在西方的不同民族之间加以比较。这可以使我们避免把某一个国家的特殊属性当作现代性的本质属性。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发生性方法。在上一节中，我们简要讨论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标志着西方社会怎样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一步一步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西方现代性发育成型的过程无疑是提取现代性本质属性的重要依据。

这里我们只做粗线条的分析与综合，更深入的研究留给后续文章。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列出这些重大事件中的核心要素，然后再把这些要素综合起来。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现代性的两个本质属性。

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事件涉及的核心要素可列举如下：

文艺复兴：人本主义，思想的独立，完善的人

宗教改革：个人的良知，信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

科学革命：数学、实验、齐一性、普遍性

启蒙运动：个人的自立，理性的至高无上

工业革命：机械化、专业化、资本主义、商业主义

政治革命：民主、法制、权力制衡、人权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六大事件隶属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社会领域。工业革命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革命当然属于政治领域，而其余的四项主要属于思想文化领域。

在如此众多的要素中，什么是对于现代性最本质的？如果把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可以归纳出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总体特征。这个特征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不断地从传统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其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

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完美健全的个人是其理想目标。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文艺复兴不只是把人类的关注重心从神移到人，而且最终移到人类个体。与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虽然是一条折中的道路，但是它无疑把个人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革之后，个人可以绕过教会直接与上帝取得联系。

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弘扬了人类理性。个人借助理性从传统的迷信和盲从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现代科学不仅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探索世界的方法。在这种新的方法中，个人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而不再一味被动地听从《圣

经》的教导。启蒙运动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理性是个人获得自立的必要手段。

最后，政治革命把个人从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个人，严格地说，有理性的个人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从法国大革命到现代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个人从传统的多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传统的束缚包括家庭出身、年龄、性别，以及种族等。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是现代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

由此看来，**个人主义应该被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本质属性**。个人主义包括社会和精神两个方面。社会的个人主义是指个人是社会事物的核心和出发点。精神的个人主义是指个人精神的自立。

个人主义可以很好地概括西方现代社会中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总体特征。但是西方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却并不是由于个人主义。尽管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商业主义有紧密的联系，**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劳力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步被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取代。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除了一些特殊的物品，如盐，需要通过商人供给，其他的生活物品都是自己或本地人生产的。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尤其是在手工业中，产品在本地供过于求，商业逐步发展起来。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手工业就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这一时期机器的动力是水车。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有些作坊开始专门为利润而生产。工业革命无疑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

综合以上两点，工业化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新的物质平台，而在这个新的平台之上，个人在社会和精神领域都得到了解放。因此，**我们可以把工业化和个人主义看作现代性的两个本质属性**。缺少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一个社会都不能称作现代社会。

四、西方的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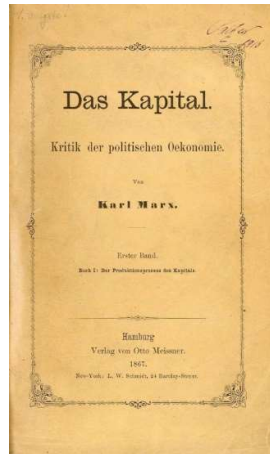
在现代性的两个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再反过来对西方现代性做总体性的批判反思。这里我们会看到西方现代性的特殊属性。具体说来，**西方现代性是对现代性核心理念的一种特殊的实现**，而这也表现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各个领域。

实际上，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接连不断。大约五个世纪的西方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性质很不相同的前后两个时期。在前半段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中，西方人努力挣脱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在后半段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中，西方现代性逐步发展成型。而一旦西方现代性有了雏形，西方人的批判反思就已开始。

西方人自己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主要有如下几个阶段：

浪漫主义：针对启蒙运动极力推崇理性，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与启蒙运动相对立，浪漫主义强调情感、灵感、主观性和个人体验。浪漫主义者鄙视冷冰冰的、物质化的现代科学的世界，捍卫人的尊严。

共产主义：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很快发展成型。大批农民涌向城市的工厂，过着比先前更艰苦的生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做了深入系统的解析。



《资本论》第一卷（1867）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第一个系统性批判反思。此后的批判反思有了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战争反思：二十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世纪之交的西方乐观主义信念。许多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毁灭感到震惊。这促使西方人对西方现代性做深入的批判反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们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但是对其做了重大发展。

环境资源问题：二战之后，西方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出现了新的维度。在物质主义、盲目追逐利润和战争灾难之外，人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新的问题：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是这一时期的唤醒之作。

后现代运动：二十世纪晚期发端的后现代运动，把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带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它继承了先前所有的批判思想（如对理性至上的批判、环境主义），同时加入了更新的维度（如对科学活动的进一步批判反思、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

上述对西方现代性不断深入的批判反思的基础是，西方现代性在发展成熟之后，其中固有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西方在自我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现代社会也做出了一定的变革。这使得西方现代性在总体上变得很复杂。西方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总的来说仍然是在自

己的文化框架中进行。我们现在要对西方现代性从外部做批判性考察，需要区分文化的主流与自我批判变革，并把目标定在主流上。

在博士论文中，我提出了**西方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的特殊属性：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两者都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尼采宣称“Gott ist tod”（上帝死了），但实际上上帝换了一种形式仍然在活着。**正是因为上帝还在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世界，西方现代性发端时期，文艺复兴中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最终得到彻底实现。**

我们先来看看**文化领域**。现代科学和启蒙思想无疑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主导要素。它们个人思想解放的基础。现代科学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使人们从许多传统的愚昧观念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与传统的盲信相对立，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价值，并且倡导个人通过理性获得自立。这些是现代性的核心要素。

然而在西方现代性中，科学和理性却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垄断地位。一方面，科学的方法被毫无疑问地运用到世界的所有领域。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被强行纳入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另一方面，理性的原则被运用到人类的各项实践，效率被当成指导人类一切活动的准则。由此，功利主义成了主流的哲学思想。

在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中存在着人和神的对立。与绝对的、永恒的、纯洁的神的世界对立的，是相对的、短暂的、污浊的人的世界。人与神相比处于卑微的地位。科学和理性是插向基督教文化的两把利剑。它们极大地提高了人的地位。

然而等到西方现代性发展成熟之后，最终结局如何？我们看到的是，**科学的世界径直取代了神的世界，仍然与人的世界相对立**。传统的对立关系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新的对立中。此时，科学的世界是绝对的、永恒的、纯洁的，而人的世界依然是相对的、短暂的、污浊的。科学总是“客观”的，正确的，只要一牵扯上人，事物就变成“主观”的、不可靠的了。有人甚至明确宣称，人类的所有思想和情感都是表层假象，而真实的世界不过是神经元中的电信传输，甚至最终是基本粒子的运动而已。

在观念世界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人类个体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大机器面前，变得愈发无能为力和身不由己。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整天围绕着机器，只通过感官与机器不断发生联系。

这把我们带到了**经济领域**。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充沛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有了很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则进一步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而自由的市场把物质产品带到了千家万户，让更多人享受到现代经济的成果。与科学和理性带来了个人精神的解放相仿，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把个人从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然而当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极致之后，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生产盲目地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广告极力地勾起膨胀的欲望，以创造额外的市场。结果是金钱和物欲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商业化。现代经济以越来越高的效率满足人们无止尽的物质欲望，并由此带来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西方现代性最终走到了其基本原则的反面。逃离自然奴役的初衷带来了新的自然奴役：难以满足的物欲和恶化了的自然环境。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政治领域**。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以个人为出发点。它摧毁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并且进一步把个人从其他的束缚，诸如年龄、性别、种族中解放出来。其政治理想是，个人不应再因为社会地位、财富、年龄、性别、种族受到歧视。公正的法律体系取代了传统的规章制度，成为规范人际关系的标准。个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促进了个人的社会解放。

然而，把这样的社会自由观念极端化，我们最后看到的是抽象个人意志基础之上的自由。只要不干涉到别人，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就是自由的。之所以说这种意志是抽象的，是因为它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制约。因此，一个人无论做如何颓废之事，例如沉溺于色情和毒品，只要这是他自愿的，社会都无权干涉他的自由权力。这样，一切价值都变得毫无价值。这种抽象的个人意志同时被变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正因为它是抽象的，它也是绝对等同的。所以在选举中，每个人的意志都以单位计算，即一人一票。不论个人的学识、眼界，每个人的意志都同等重要。

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和经济领域走在前面，政治领域相对要滞后许多。因此，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最先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其发展成熟之后也变得明显。相比而言，民主制度中的问题直到近期才开始展示在人们面前。在这些不断彰显的问题面前，人们一定会对民主制度有更深入的反思。

统观西方现代社会的三大领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总体模式**。在现代技术和工业所构建起来的物质平台之上，西方现代性在努力提高人，更准确地说，个人的地位。它试图把个人从诸多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束缚包括精神的、自然的和社会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个人解放运动是不彻底的。基本上是旧的束缚最终被新的束缚所代替，个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科学和理性战胜了盲从和信仰，但是当它们被绝对化之后，又变成了新的思想束缚。丰富的物质财产减少了自然的奴役，但是许多人显然又变成了物欲的奴隶。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则又使许多人沉溺于传统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颓废文化。

当追问西方现代社会中问题的根源时，我们需要回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在深层文化上，西方现代性中包含着挣脱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最鲜明地反映在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中，但是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在总体上并没有沿着人本主义的方向。基督教文化中蕴涵的普遍主义和

平等主义在西方现代性中仍然被保留下来。结果，个人从诸多传统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又被加上了许多新的束缚。在传统社会中个人需要挣脱封建宗法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同样需要挣脱更加强大的现代体制。这些特殊属性表明西方现代性上带着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是**西方**的现代性。

第四章 二次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复兴

在对西方现代性做了总体的解构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中华文化。

前面我们提到，**建构中国现代性有三个重要的步骤。首先，我们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区分中国的和传统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构成中华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它是中华文化的本质特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性。离开了它，一种文化就不能被称为中华文化。而传统的东西只对应于中华文化的一定发展阶段。这些东西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抛弃的东西。

其次，我们应在西方现代性中区分西方的和现代的东西。现代的东西是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离开了它，一种文化就不可能被称为现代文化。在目前的人类历史阶段，尽管在西方现代社会之外也已存在现代社会，但是在严格意义上，一种与西方现代性相当的替代现代性还没有真正出现。然而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开始建构替代现代性，而在替代现代性中，我们正是要滤除西方现代性中西方的成分。

最后，在明确了中国性和现代性之后，我们需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机的结合不能只是简单地混合。简单的混合物只是部分之和。相反，有机的结合物通常会大于部分之和。有机结合物的部分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在相互结合之后会产生全新的东西。

在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中，我们区分了现代的和西方的东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再来对中国的和传统的东西从总体上加以区分，并对中国性和现代性的结合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何谓二次复兴

“兴”是兴旺发达的意思，而“复兴”就是重新兴旺发达。在西方现代化过程的早期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指古希腊罗马繁荣的文化艺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晦暗之后重新繁荣起来。在西方，文艺复兴用法语单词 Renaissance 来称谓，其本意是再生。显然它比中文的“复兴”一词更具戏剧性。

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它经历了多次兴衰。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在每次衰落之后再兴盛起来，中华文化都实现了一次复兴。这种意义上的复兴不止对应于朝代的更替。在中国较长的朝代内部甚至有多次复兴。西汉衰落之后，王莽统治了十几年时间，甚至把朝代都改了。但是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汉朝，开始了东汉时期。唐朝中期出现了安史之乱，社会呈现动荡混乱状态。但在平定了安史之乱后，社会又重新恢复繁荣稳定。

我们这里讲的复兴显然不是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复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许多朝代，但并不是每个朝代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少数的几个亮点。

它们包括秦灭六国开创大一统帝国，汉武帝的拓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北宋的文化兴盛，明朝郑和下西洋和技术的长足进步，以及清朝的康雍乾盛世。这些亮点可以看作中华文化的重大复兴点。

在考虑上述的历史亮点时，我们仍然停留在经济政治层面上，而没有到达文化的深层、文化的内核。如果我们站到文化的深层，我们会发现明清两朝总体上运作在宋代建立的文化框架中。明清两朝在经济政治上有了新的发展，但在深层文化上基本上继承了宋代的体系。

另一方面，在深层文化上，汉朝继承和综合了先秦的思想，巩固了中华文化由巫术到人文主义的蜕变。严格说来，这也不能算作文化复兴。而在唐朝，印度的佛教在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方面，唐朝总体上继承了前世的成就。

在中国的前现代历史中，我们只是在宋代看到了深层文化上的复兴。 开始于北宋的宋明道学是对先秦思想的复兴，当然主要还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为什么说这是深层文化上的一次复兴？因为自从汉朝灭亡之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中国不断发展，在唐朝影响到达高潮。而佛教对中国先秦的思想构成一个重大的冲击，并且削弱了后者的影响。宋明道学恢复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力。我们后面会谈到的，这种传统的复兴并不是以驱逐外来佛教的形式出现。相反，它把许多佛学的思想融合在其中。

在中华文化第一次深层复兴的背景上，中华文化的第二次深层复兴就变得很明朗。第一次深层复兴之后，中华文化在明清时期一直在宋明道学的框架中运行，直到在晚清遭受到第二次外来文化的重大冲击。这个外来文化就是西方现代性。所以，**中华文化的第二次深层复兴，就是要在遭受西方现代性冲击之后重新恢复传统的影响力。**

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发现在深层上它并没有超出基督教的框架，因为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理念仍然保留在西方现代性中。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实质上就是基督教的冲击。这样，中华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嬗变，都与外来人类主要文明的冲击有关。中华文化在宋代的嬗变是印度佛教冲击的结果，而现代正在发生的嬗变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冲击的结果。正如中华文化的第一次深层复兴以应对佛教为基本任务，目前正为之努力的第二次深层复兴以应对基督教为基本任务。

二、归本溯源

在应对基督教、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辨明中国性，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因为中华文化已经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重大冲击，为了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我们首先要归本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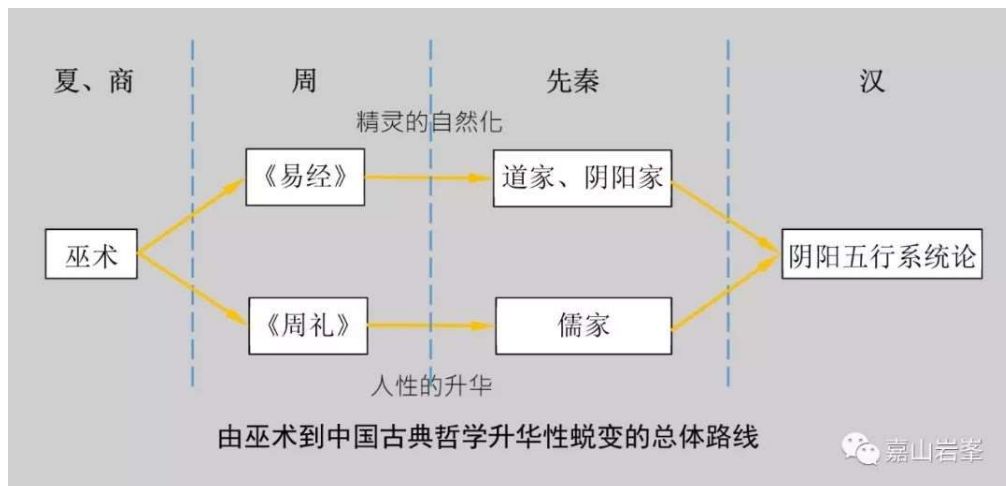
“归本”是要回归到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在中华文化的源头，它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还保持在本真状态。在那里，我们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具体来说，我们溯源至少要追溯到汉代，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就开始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

在别的文章里我们曾谈到，追溯中华文化的源头，我们需要深入到巫术之中。**巫术是中华文化得以萌发的土壤**。巫术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创生的必经阶段。巫术的基本世界观念是泛灵论，也就是说万物皆像人一样有灵性。这实际上是原始人类将自己的精神直接投射到整个世界的结果。

人的精神相互之间可以影响和沟通。把这种关系投射到世界中，我们便得到巫术中的交感原则。交感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如相似律，显然与人类思维中的规律相类似。在人类思维中，相似的观念之间会相互影响。把这种关系投射到世界中，相似的事物之间也会产生影响。例如，原始人类相信田头做爱可以促进庄稼生长，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庄稼的精灵会受到人类繁衍活动的感染，于是也会变得多产。

中华文化从巫术中创生出来，经历了一场升华性蜕变。这种蜕变包括精灵的自然化和人性的升华两个方面。精灵的自然化就是去灵化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世界没有了灵性，变成了自然而然的自然世界。与此同时，人被从与精灵的对等关系中提升出来，变成了天地之心、万物之灵。由此，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

自然主义认为世界本身没有灵性，它不是精灵，也不受精灵的操纵。人文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因为只有人具有灵性。两者是世界观念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先秦百家中，只有儒家和道家最完善地体现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方面。儒家以人事为核心关注，但同时奉行自然主义；道家提出了自然的观念，但同时也以人事为核心关注。尽管在对待具体事物，如周礼的态度上，两者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在深层文化上两者是非常一致的。



巫术的升华性蜕变在周朝发端，在先秦成型，在汉朝得到巩固。《周礼》是巫术仪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它为儒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在《周易》之中我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世界开始脱离精灵的影响，在按照自身的象数独立地运行。这又为道家的自然观念做了准备。

孔子以“仁”释礼，实质上是以“人”释礼，即从人类本性出发去阐释周礼的规范和仪式。由此，礼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体制，而变得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与人休戚相关。老子创立了“自然”的观念，庄子则把自然观念发挥运用到人事领域，创立了“逍遥”的观念。逍遥的要义就是要顺从宇宙和人类的自然本性。

在儒家和道家之中，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想已经成型，但是在天人之间仍存在张力，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还没有明确融合到一起。这种融合在西汉的阴阳五行系统论中得到实现。董仲舒的阴阳五行系统论把天人融合到一起，是囊括整个世界的统一思想观念体系。处于这个思想体系核心的是有机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世界犹如一个生物机体，每个部分都相互勾连。我们在大宇宙中看到的是天人合一，在人的小宇宙中看到的又是身心合一。

融合在一起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它首先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一元性**。在中华文化中只存在以人为核心的一元世界，这把中华文化与所有其他的以宗教二元世界为特征的人类主要文化区分开来。在二元的世界观念中，在人的世界之外总是还存在着一个超人的世界。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都相信生死轮回之外的涅槃境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相信人世之外的天堂。所有的宗教文化都以努力超出人世为特征。相反，中国人却在人世之内追求超越。

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融合甚至把中华文化与同样包含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西方现代性区分开来。现代科学的兴盛动摇了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中的超自然主义，实现了向自然主义的转变。与这种世界观念的革命性转变相应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个人地位的提高。

然而，我们在西方现代性中看到的却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不断的张力。自然主义在西方现代性中以科学主义的形式出现，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西方总是处于对峙状态。同样，天人之间时常处于不和谐的关系中。一方面，在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念中，人像在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中一样处于卑微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当个人被解放之后，我们看到的又是物欲横流和人类通过现代技术对自然的掠夺式滥用。西方后现代思想家放眼东方、寻求灵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文化的基础。

我们现在需要做归本溯源的工作，因为中华文化的本源在后世变得模糊不清。其中一个基本偏离发生在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关系上。儒道两家本来都是同一思想革命的两个不同的侧面，都是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体。可是到了后来，儒道两家之间居然有了“入世”和“出

世”的对立。岂不知儒家的最高追求同样超越日常生活，甚至是江山社稷；而道家的最高追求同样是潇洒地度过此生。

另一个基本偏离发生在儒家内部。孔子以仁释礼，把礼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以此开创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可是到后来，礼居然变成了礼教，一种外在于人而又约束人的东西。最初的“以人释礼”甚至最后变成“以礼杀人”。与此相应，孔夫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圣人也被变成了冷冰冰的神来膜拜，而《论语》则变成了《圣经》。

对这些偏离的追问把我们带到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嬗变。

三、应对佛教

源自印度的佛教大约于西汉末年，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在汉代中国的本土文化很强盛，外来的佛教还没有发展的机会。佛教信奉灵魂不灭的超自然主义，这与中华文化中的自然主义有明显的冲突。在东汉初年，王充著有《论衡》，在其中运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对迷信中的灵魂不灭论做了系统的批判。

汉朝末年社会进入纷乱动荡状态，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低谷。这也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经过这一时期的不断传播，到了唐朝时，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高潮。此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形成多个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和禅宗。

与基督教相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首先，佛教徒并不像基督徒那样急切地向别人传教。和尚上门来主要是为了讨口饭吃，而基督徒上门来主要是想把上帝介绍给你。其次，佛教传到中国来不带有任何强迫。印度当时远在天边，中间也不存在任何势力有意要把佛教传到中国。这与基督教对中国的冲击形成鲜明对比。再次，佛教传到中国不但没有强迫，反而是中国人主动地把僧人请来，甚至是自己走过千山万水把佛经从印度取回来，并且再花大力气把它们翻译成汉语。

这种现象表明，佛教和佛学思想一定与中华文化有深层的默契，或者至少构成一个重要补充。其实，中国人在主动引入佛教的过程中已经对其做了选择，甚至是做了很大改造。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禅宗中。禅宗主张佛性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为了成佛不需要经由充满清规戒律的修行。时机一到，条件成熟，佛性便可以经由顿悟通达。这无疑是把佛教人文化、中国化了。

然而，佛教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作为一种超自然、超人世的宗教，它与以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还是有基本的冲突。佛教在中国盛行之时，正是儒道两家影响衰微之时。

在晚唐时，佛教已经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大批人出家当和尚，种地的人自然越来越少。由此出现了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反佛思潮。这进一步引出了宋明道学的创立。



禅宗公案：沩山踢瓶

公案是禅宗传达佛教思想的一个主要方式。公案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其中往往会包含一个问题和不同的解答。在高明的解答中蕴涵着对教义的深刻理解。沩山踢瓶这则公案所要传达的禅宗要义是，不要拘泥语词，因为禅宗的一条基本教义是不立文字。（图片来源：sanbaodi.com）

宋明道学正是要在佛教盛行、中华本土文化衰微之后，重新回归到儒家和道家。所以，它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大复兴。道学包括理学和心学两个流派，前者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象山和王阳明为代表。虽然两派都以复兴孔孟之道为己任，但是他们对孔孟之道却有不同解释。理学重天理，而心学重人心。

宋明道学是中华本土文化的复兴，但是此时佛教的影响已无法回避。先秦名家中有类的概念，但却没有明确的理的概念。在汉代的阴阳五行系统论中，我们看到的是阴阳的相互包含与转化，五行的相生相克，独立的、实体化的理的观念在其中也很陌生。理的概念似乎只能在佛学中找到源头。心学与唯识论之间同样有着很大的亲缘关系。总的来说，宋明道学是中华本土文化与佛学的综合产物。

与佛学思想的融合显然带来了一些对传统的偏离。理学中的**天理人欲之辨**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性偏离。原初的孔孟之道都以人性为基础，而人欲又是人性的基础。无论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孟子的“恻隐之心”，都以人的情感和欲望为基础。而理学则把人性基础之上的孔孟之道解释成人之外的天理，并且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这显然是在把儒家佛教化。

与这种综合性思想体系相伴的是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发展完善。由此，“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华学人的一条标准出路。随着儒家，更确切地说，被重新阐释了的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科目，儒家也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

佛教是中华文化受到的第一次外来人类主要文明的重大冲击。正是由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自发性，这第一次冲击也是异常的深刻。在**以应对佛教为基本任务的，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复兴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重大嬗变。**一方面，儒家偏离了原初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道家被放逐到文化的边缘，甚至与佛教为伍。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我们清晰描绘出这样一幅文化图景：在大观园的正厅之中充满着孔孟之道的威严，但是在那里人却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只有到了后花园中，才能放纵一下自己的性情，发出爽朗的笑声。贾宝玉最后看穿了红尘，选择了出家的道路。宋明道学到了清代已经确立了垄断地位。

鲁迅对中国的传统社会做出了如下的评论：满口的仁义道德背后却清楚地写着两个字——“吃人”。现在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而这正为华夏文明的第二次复兴带来了希望之光。

四、应对基督教

最后，我们回到当下的时代课题。

在宋代中华文化的第一次深层复兴中，在多个世纪的本土文化衰微和佛教影响渐盛之后，中国的哲人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道两家的思想，而居于其核心的又是孔孟之道。同样，在目前我们正为之努力的中华文化的第二次深层复兴中，我们要在中华文化经受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冲击之后，再一次找回自己的传统。

比较中华文化受到的这两次外来人类主要文明的深刻冲击和对应的两次深层复兴，我们会发现，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要漫长、缓和得多。因此，佛教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华文化的底层，以至于许多人把儒、道、释并列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相比而言，基督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短暂得多，但是也剧烈得多。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究其原因，在佛教的冲击中，中国人处于主动的地位；而在基督教的冲击中，中国人时时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基督教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中华文化与一个更加不同的外来文化对峙，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反省和自我认识。这同时也使得佛教的冲击变得更清晰。而反过来，应对佛教的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复兴，又会对应对基督教的第二次复兴提供重要的借鉴。为此，我们目前做应对基督教的理论建构，首先要明确儒、道、释、耶四者的关系。

（一）儒道合一，释耶兼融

按照我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构想，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复兴应该遵从“儒道合一，释耶兼融”的总体原则。

儒道分别指儒家和道家。两者都创立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旧的氏族社会解体，并向新的大一统帝国过渡的时期。旧的社会体制的解体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纷呈。一时间产生了多个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只是其中的两个。此外，主要的还有墨家、法家和名家。这正是中华文化萌发的时期。在后世的发展中，儒道两家获得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

释耶分别指佛教和基督教，因为两教的创始人分别是释迦牟尼和耶稣。佛教和基督教是人类的两大主要宗教。两者属于不同种类：佛教接近多神教，而基督教是一神教。与以人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相比，佛教和基督教在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上都有很大差异。在后两者之间做比较，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距离比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距离更远。

中华文化经历了先秦时期的萌发之后，在汉代奠基并发展成型。在汉代之后，中华文化先后受到了佛教和基督教这两个人类主要外来文化的冲击。在宋代，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复兴是对长期佛教冲击的反应。到了近现代，在近两个世纪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之后，中华文化中包含了儒道释耶四个方面的要素。

我们今天如何去应对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处理好儒道释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宋明道学为基础去融合西学，还是回归到原初的中华文化，在它和西学之间探讨综合的可能性。宋明道学作为应对佛教的成果，其中渗入了诸多佛学思想。**儒道释耶关系的核心是儒道释三者的关系。**

儒道两家虽然同是巫术升华性蜕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两者不同的侧重，它们之间的距离在后世不断地拉大。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是巫术升华性蜕变的两个主要成果，而它们渗透在儒道两家之中。儒道两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者在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间有所侧重：儒家更侧重于人文主义，而道家更侧重于自然主义。这使得它们对待周礼持不同的态度。结果，维护周礼的儒家变成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基础，而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总体上被放逐在文化江湖上。道家在中华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大部分时间里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儒家垄断的正统地位甚至把道家推到佛教的身旁，让其与佛教为伍。由此，在传统的儒、道、释三大文化要素中，我们看到儒家一家独大，代表着正统的体制，而道释则聚在另一端，代表着体制的他者，与体制相对立。这种文化格局清楚地反映在《红楼梦》中。

然而在根本思想上，道家显然与儒家间有近得多的距离，与佛学则大相径庭。 与儒家相同，道家的关注核心也是人生。从杨朱的贵生，到老子的无为，再到庄子的逍遥，道家所关心的最

主要问题是人如何很好地度过此生。相反，和其他后期的宗教一样，佛教对人生所采取的也是贬斥的态度。具体来说，人生是一片苦海，是生死轮回中的一个短暂的片段。理想的世界存在于人生之外，是彻底超脱轮回的涅槃境界。与此相应，与道家的自然主义相对立的是佛教的神不灭观念。

除了儒家的垄断地位，道教的出现也使得道家的本性变得更加模糊不清。道教产生于汉朝末期。它是道家思想和巫术基础上的乡间迷信的混合产物。它一方面把中国古代的神仙观念系统化，造出中国的天宫形象；另一方面又把道家的贵生思想转化为长生不老的追求。炼丹相应成为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途径。这里我们已经能看出道家和道教在根本思想上的重大区别。**道家讲求顺应自然，泰然地面对死亡，而道教却努力地避免死亡的到来。**

即便如此，道教仍然对人生表现出特别的眷念。追求长生不老，前提仍然是觉得人生很美好。这甚至把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佛教区分开来。在《西游记》中，我们看到佛道两教不断的斗争。从孙悟空大闹天宫开始，一直贯穿于唐僧取经的整个过程。唐僧师徒在取经的路上不断地受到各路妖怪的骚扰。而妖怪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吃唐僧的肉，然后长生不老。显然，唐僧成了道士们实现长生不老的那颗仙丹。

我们今天强调儒道合一，意在明确中华文化的原初本性。这个本性就在于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完美结合。在文化深层的儒道合一最能体现这种完美的结合。统观人类的所有文明，这种完美的结合只存在于华夏文明之中。它因而构成华夏文明独特性的基石。

我们明确中华文化的原初本性，目的不是要返回到中华文化的原初状态，而是为了更好地去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更清楚地去融合外来文化的要素，以使得中华文化在保持本性的同时，永葆青春的活力。佛教和基督教同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类主要文化。对于两者的深刻冲击，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态度，既不是盲目的拒斥，也不是盲目的采纳。相反，我们应该立足自身文化，对两者做有机的融合。

佛教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能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中华文化之中，必然有着深层文化的缘由。我目前的想法是，**佛教在如下两方面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补充。**首先，**儒道两家中缺乏对主体的深入反思，而佛教首次填补了这项空白。**为此才有了宋明道学中的“格物致知”，以及心学中深入的主体性反思。其次，**儒道两家所追求的超越，对个人的修养有很高的要求。而佛教为普通人超脱现世生活提供了一种容易的选择。**当一般老百姓在生活中遇到了重大挫折，企图找到超脱时，他很难一步成为圣人，但是出家入佛门却是很容易的事情。

同样，**基督教的深层文化影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基督教的基础主义观念使得人们能够远离人的生活世界，对物质世界做越来越深入地探索。**现代科学的创立与这种基础主义观念息息相关。而且对现象背后基础本源的追求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其次，**基督**

教中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使得个人很容易从人类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中超脱出来。在基督教的世界体系中，人与上帝的关系总是高于人与人的关系。我认为这两个方面也正是西方现代性的精髓。

把佛教与基督教相比，显然前者离以人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更近。佛教虽然也讲对人世的超脱，但严格说来，其中并没有神在控制着人类的生活。而在基督教中，人完全屈服于神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尼采看得最清楚。

（二）组织自然主义

在对中华文化第二次复兴的总体原则做了概要讨论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基本观念。文化的基本观念包括世界基本观念和人生基本观念。在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讨论**世界基本观念**。

传统基督教的世界基本观念是以上帝为核心的超自然主义。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并且在此后操控着世界的运行。而上帝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它外在于现实的世界，并且控制着现实的世界。由于受到外在精神的控制，现实的世界就不是自然的世界。

在西方现代的科学世界观念中，传统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被自然主义取代。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世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在运行，不再受到外在精神的控制。然而，现代科学的自然主义与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却有着基本的关联。与基督教相似，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世界现象的背后有外在操控的力量。这种外在力量首先以自然定律（Laws of Nature）的形式存在。在自然定律之外，现代科学对世界本源的追求还表现在对物体微观结构的探求。对自然定律和物质元素的追求是西方现代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这种自然主义是**物质自然主义**。

现象背后的定律和物体深层的结构都是事物的本源。**现代科学的世界本源观念与基督教的世界本源观念一脉相承**。从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到现代科学的自然主义，精神本源转变成了物质本源，但是世界本源的基本观念并没有变。

接着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中华文化的世界基本观念。在中华文化中，巫术经历了蜕变之后便产生了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念。这发生在先秦时期。在儒道两家中，自然主义都已经变得很明确。然而，中华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与西方现代的自然主义却有实质性的不同。它主要体现在阴阳五行系统论中。**与西方现代的世界基本观念相比，阴阳五行系统论有如下三点基本的区别**。

首先，在西方的世界观念中存在着明确的两极对立。在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本质、本源，后者在控制着前者。甚至在现象世界中存在着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和斗争，而在理想世界中总是光明战胜黑暗。**相比而言，阴阳和五行都不是现象背后的控制力量或物质元素，而是现象的直**

接属性。阴阳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理想的世界不是阳战胜了阴的世界，而是阴阳和谐的世界。



太极阴阳图

太极阴阳图生动地展现出中华文化中的阴阳观念。阴阳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两者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便构成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对立的两极，只有有机的整体。

其次，西方追求的本源世界是超越时间的永恒世界。现象发生在时间之中，但是现象背后的本源却处于时间之外。自然定律是不随时间推移的永恒定律，物质元素本身也是永恒不变的。相比而言，阴阳和五行的世界总是处于运动之中。阴阳之间在不断地相互转化，五行之间也不时地处于相生相克的变化之中。



五行相生相克

中华文化中的五行显然不是物质元素。它们与物体的质料相关，但主要是功能性的概念。因此，五行不是物体静止的组成元素，而是充满着活力。五行的相生相克构成一个生动、纷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存在单一的本源，世界就是现象本身。

再次，西方的世界可以拆分、还原为基础的单元，基础单元通过简单的组合就可以构成宏观的世界。这种观念受到机器结构的启发，但是与基督教的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也有深层的关联。阴阳五行系统的世界与此截然相反。其中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由此，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无法拆分成基础的单元。

传统基督教的超自然主义把精神看作世界的本源。西方现代科学的自然主义把物质看作世界的本源。而中华文化中的自然主义并不包含明确的世界本源观念。虽然世界没有现象之外的本源，但是中华文化的世界观念总体上以生物机体，更确切地说，以人的机体为范本。人的小宇宙和世界的大宇宙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因此，中华文化中的自然主义可以称为**有机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

精神本源、物质本源和机体模型都是对世界的片面观念。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显然包括所有三者：从物理化学过程，到生物机体，再到人的精神和社会文化。一种世界观念如果偏执其中的一端，必然会很片面。世界不全是精神，不全是物质，也不全是一个生物机体。世界观念上的唯物和唯心之争，实际上只是西方世界本源观念框架之中的问题。如果我们抛弃世界本源观念，不论是唯物还是唯心，都变得没有意义。我们在中国哲学中从来不提唯阳、唯阴、唯金、唯木，等等。

那么世界的共性何在？组织。物理化学过程、生物机体、精神文化都是具有不同复杂度的组织。为了把中西方的世界观念综合起来，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组织自然主义**（Organizational Naturalism）。组织与阴阳五行一样，是共性，而不是本源。具有不同复杂度的组织构成一个谱系。在组织的谱系中正映现着一个纷繁多样的世界。

组织自然主义以中华文化中的有机自然主义为基础，但它同时又超出有机自然主义，把物质自然主义和精神文化世界包括在其中。物质自然主义、有机自然主义和超自然主义都偏执组织谱系的一部分，然后把某一部分的特殊属性外推到整个世界。这好比是瞎子摸象。只有把所有的偏见综合起来，我们才能构建出世界的整体图景。篇幅所限，对组织自然主义的详细讨论另见他文。

（三）多元精英主义

世界观念之后，我们再来谈**人生观念**。

在**传统基督教**的世界中，人显然处于卑微的地位。个人出生之时便带着原罪。人生就是赎罪的过程，目的是在死后得到拯救进入天堂。如此，人生只不过是整个精神历程中的一段短暂序曲。人的肉体是灵魂拯救的负担，所以人的欲望在基督教中受到压制。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把传统基督教的道德直言不讳地称作奴隶的道德。

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中，我们看到了与传统基督教世界截然相反的世界。在文艺复兴的世界中，人忽然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一时间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楷模”。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达·芬奇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典范。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中则有哈姆雷特。人文主义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

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性的开端。它为西方现代化过程定下了基调。现代化过程的主旋律就是个人的解放，即把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多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在西方现代性中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现代科技基础上的实证理性和工具理性最终取得了垄断地位。理性和人性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于西方现代性中。按照尼采的说法，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之间的张力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方的精神历史中。而在西方现代性中，最后还是日神精神居于主导地位。

诚然，**西方现代性中不乏个人的解放和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但是被解放了的个人主要屈从于普遍和平等的原则**。普遍和平等的原则在文化领域表现为现代科技的垄断。由此，人的生活世界被强行地纳入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念，被数学化、机器化。而在由现代技术所构建起来的现代大机器面前，个人越来越应接不暇，最终甚至被化为碎片。普遍和平等的原则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资本的垄断。于是金钱变成统一的标准，物欲主导了人们的生活。最后，普遍和平等的原则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抽象个人意志的垄断。于是，与学识、眼界和境界无关的公民个人意志均等地成为政治权利和社会政策的基础。

中华文化中人的观念与西方迥异。巫术在经过蜕变之后，在世界被自然化的同时，人被确立为宇宙的核心。“人为三才中”，人是“天地之心”。人事是儒家和道家关注的核心，而儒道两家是中华文化的支柱。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楷模”。中国人在先秦时期就持有这种观点。因此，**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一样，是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要素**。

以人为核心，从人的本性出发，**中华文化所追求的超越也存在于人的世界之中**。这种超越以**圣人理想**的形式存在。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中也有圣人，但是西方的圣人是接近神性，远离人性的人。而中国的圣人却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充分实现人性的人。中国人信奉人生有不同的境界，而且人生的境界可以通过修养来提升。**人通过修养来提升自己的境界和觉悟就是在充分实现人的自然本性，因为在天地之间只有人具有觉解的能力**。

在西方现代性中，个人被从传统的宗法体系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自由的个人却是普遍平等原则之下的抽象个人。在现代启蒙文化中，他是有理性的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他是人力资源和消费者。在民主政治中，他是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在普遍平等原则下，人的许多个性都不重要，人生的境界尤其没有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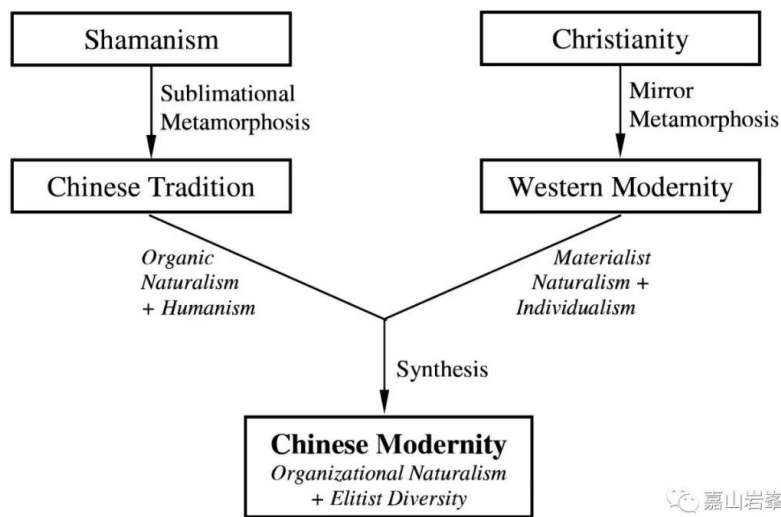
与此相反，人生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圣人理想不只是文化人的理想，圣人同时也被社会上的普通人崇拜。**在政治领域则有圣人治国、精英治国的理念**。精英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是，精英是有崇高境界的人，而国家应由精英们来治理。这里的境界不只是通常所说的道德境界。按照冯友兰的说法，人的最高境界是超道德的天地境界。**中国的精英主**

义思想与西方普遍平等的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基于中华文化中人的基本观念，后者则基于基督教文化中人的基本观念。

在西方现代性中有个人的解放，然而个人却仍然屈从于普遍平等的原则。人文主义始终受到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制约。在基督教文化的总体框架之中，人文主义很难像在初期的文艺复兴中那样得到充分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居于核心地位，然而个人却受到传统宗法体系的束缚。因此，圣人理想和精英主义都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进而，圣人理想带有许多时代的局限。精英主义也非常正统、单调。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引入了西方个人解放思想，摧毁了自身传统的宗法体系。但同时中国也引入了西方普遍平等的原则，包括科学世界观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法制观念。**这些普遍平等的西方现代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摧毁了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人文主义。**目前，中国在文化上找不到自己的认同，原因就在于自己文化核心的丧失。

中国的现代化显然不应该是抛弃自我，全盘西化。相反，它应该在保持自我认同的前提下，去融合西方现代性中的要素。中华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其独特的人文主义。只有保留这个人文主义核心，我们才能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而西方现代性中核心的现代要素则是个人的解放，个人主义。所以，**我构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在人生观念方面的综合，就是中国的人文主义加西方的个人主义。**我把这种综合称作**多元精英主义**（Elitist Diversity）。精英主义意在拒斥西方普遍平等的原则。多元意在标示个体的多样性，个性。同样，对多元精英主义的详细讨论需要放到别的文章中。



中国现代性总体构想

这幅图取自我博士论文的第十章。其中描绘我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想。在图的左面，中国传统文化从巫术经由升华性蜕变产生。在图的右面，西方现代性从基督教经由镜像蜕变产生。中国传统文化

的两个核心是有机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西方现代性的两个核心是物质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两者的综合，中国现代性包含组织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念和多元精英主义的人生观念。

（四）具体的扬弃与综合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讨论一些具体事项，把上述的世界基本观念和人生基本观念落到实处。

在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中，**儒家思想是最需要革新的**。其根本原因是，儒家被用作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思想基础，中国旧有的封建体制与儒家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打着“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在很大程度上把孔子看作旧体制的象征，把儒家思想等同于旧的封建体制。这种做法对原初的孔孟之道有很大的曲解，但也有其中的道理。因此，我们今天建构中国现代性最需要对儒家思想做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在其中做精微的扬弃工作。

与儒家相比，道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总体上处在与体制相对的一极。也正因为如此，**在旧的体制崩溃之后，道家思想可以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道家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着浪漫的侧面，而这种浪漫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性中的浪漫主义合拍。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个体的人生有核心的关注，追求个人的自由，这本身与现代性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有一定的共鸣。

为什么旧的封建体制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根本原因是封建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平台逐渐消失。封建体制的基础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逐渐被现代的工业生产取代之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体制自然难以维系。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西欧。随着新的工业生产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区，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也蔓延开来。

“三纲五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里我们先来对其做具体的剖析。“三纲”的具体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的最初含义是操控渔网的粗绳，引申为事物的主导部分。“三纲”描绘出传统社会的总体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追溯到父权制的氏族社会。所以“三纲”是周礼的一部分。历史进入大一统帝国时期，农业生产的物质平台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三纲”也融入了封建体制。**在传统的物质平台上，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优化的结构**。在需要全社会统一合作，经验和体力占重要地位的农业生产中，大家最好听从领导的统一指挥，孩子听从父亲，老婆听从老公。“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传统文化对“五常”的解释基本上囿于“三纲”的总体框架。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把“明纲”放在首要的地位，但是他另一方面又大力地操办洋务，包括开矿山、修铁路、架报线。岂不知，洋务一办，最终“三纲”必然崩溃，因为洋务会摧毁“三纲”的物质基础。的确，在物质生产进入现代大工业之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会随着进入现代。

然而，在共同的现代物质平台的基础之上，不同的文化却可以做出不同的变革。在西方，个人从传统的宗法体系中解放出来之后，出现了原子的个人。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抽象的，只具理性的个人。社会则由抽象的个人通过契约组建起来。这样一种人的观念显然导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的世界图景中，人才可能如此抽象。而中华文化则有截然不同的人的观念。中华文化中的人是自然的人，他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由父母所生养。因而他不是先天与上帝有关系，而是处于自然的家庭关系中。

因此，我们对待传统的“三纲五常”不应只是把它们当作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以抛弃，而是要理解它们存在的历史基础。“三纲五常”一方面以农业生产的物质平台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中华文化人文主义的产物。总之，它们是从农业生产物质平台之上的自然人性中生发出来的。在历史进入现代之后，我们有了新的工业生产的物质平台，但是中华文化的自然人性出发点却可以保留。

西方现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建立在新的工业生产的物质平台之上，但是它们同时也带有基督教文化的烙印。原子的个人如何可能？宗教改革之后，个人可以越过教会与上帝直接发生关系。在西方现代性中，我们看到个人从传统的宗法体系中解放出来，但他同时也从人的自然关系中脱离出来，变成了抽象的存在。正因为基督教不是全人类的宗教，西方现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不具有人类普适性。用李泽厚的术语来说，西方现代的“社会性公德”带着西方文化的特殊性。我们在构建中国现代性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社会性公德”。

从现代工业生产物质平台基础上的自然人性出发，我们可以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进行变革，赋予其时代新意。从自然人性出发，在现代工业生产的物质平台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原子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个人仍然是父母所生养，父母仍然是夫妻，个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成长，与自己的文化又有先天的关联。因此，个人先天不是一个只具理性的原子，而是与自己的家庭和文化密不可分。“三纲”描绘了传统社会中亲子之间、夫妻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依然有亲子之情、夫妻之爱以及个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个人从传统的宗法体系中解放出来之后，在东西方可以有不同的结局。从西方基督教人的基本观念出发，个人脱离了所有的自然关系，变成了孤立的原子，因而社会需要通过契约组建起来。从中华文化人的基本观念出发，也即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个人与家庭和民族文化依然难解难分，因而个人本来就只能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也不需要契约来组建。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和民族文化正是“三纲”的时代新意。

相应地，在现代社会中“五常”也可以有新的阐释。“仁”即以人为本，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的观念出发。这是中华文化人文主义的核心。“义”即公平正义。这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正当的权益关系。“礼”即自然人化。礼不是先天外在的教条，而是

特定历史时期人之为人的行为规范。礼的关键在于得体性。懂礼的人知道在特定的场合下做出得体的行动。“智”即生存智慧。人不只是要有意思地活着，而且要有意义地活着。活出深度，活出境界。“信”即真诚处世，真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活出自我，真心待人。如此解释之后，儒道两家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分。

构建中国现代性，不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精细的扬弃工作，对西方现代性也需要做同样的工作。

现代科学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然而科学的方法最适用于组织复杂度较低的物理化学过程。对生物机体的部分属性，科学方法也有很好的应用。但是当我们进入意识和社会文化领域，科学方法的效力就越来越低。根本原因何在？数学和实验预设抽象简化方法，以及世界的普遍性和齐一性。相对简单的物理化学过程最符合这些预设前提。但是当事物组织复杂度在生物机体、人类意识和社会文化中越来越高之后，普遍性和齐一性不断降低，特殊性和多样性不断提高。因此科学方法的预设前提越来越不成立。

现代科学在物质世界的巨大成功使它变成垄断的世界观念，于是整个世界都被强行地纳入现代科学的体系。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沿着自己的轨迹与科学平行发展。而**现代技术**则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所以现代技术的原则也受到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现代科技的垄断把人类的生活世界简单化、物质化。在迅速发展的现代科技面前，人们应接不暇，再没有多少时间去静下心来思考深入的世界和人生问题，思维越来越感官化。

在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之后，中国人最先从西方引入的就是现代科技。很快科学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主导地位，甚至直到现在，科学主义还存留在众多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对现代科技过度推崇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盲目贬斥。中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代医学和中医基于完全不同的人体观念。现代医学把人体看作一个机器，而中医则把人体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现代医学治疗的着眼点在于人体的器官部件，而中医的着眼点则是身心合一的整体，而且治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现代医学在外科和传染病方面成果显著，但是对于整体性疾病则疗效很低。

现代科技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基础不是世界的全部。 在采纳和大力发展现代科技的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其特定的思想前提和适用范围。

在思想观念和物质手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现代的**社会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西方现代社会体制的基础是人的基本观念。西方现代性中的人是一个只具理性的抽象个人，而社会就是抽象个人的集合。**西方现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以只具理性的抽象个人为出发点。**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通过普遍的金钱中介来实现。生产的目的是利润，即资本的增值。这通过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来实现。消费者则用金钱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是，其中每个人都努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具有理性的个人在如此行动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用斯密的说法，在整个经济体制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在民主政治中，个人是握有一张选票的人。其中的基本假设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对自己和社会的现状有清楚的理解，能够辨明如何投票会对自己有利。通过如此投票产生的政府或者政策最具正当性。进而，如此产生的政府或政策最符合全社会的利益。

然而，**西方现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本假设成立的条件不只是具有理性的个人，而且是理想的个人。**具体说来，生产者应能为消费者的真正需要而生产，而且在生产时能够考虑到社会的利益；消费者应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实际需要；公民在投票时对自己所投票的意义有清楚的理解。只有这些理想条件都得到了满足时，西方现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才能良好地运行。

实际情况是，上述理想条件很难得到满足。首先，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就决定它很盲目、很狭隘。盲目时常导致生产与消费的脱节，狭隘则导致环境问题和虚假需求。其次，消费者中的虚假需求又导致了消费主义和资源的浪费。最后，选民的素质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民主政治在欧美之外不成功的例子很多，如今在欧美问题也不断显现。在英国，脱欧公决后不久就有很多人开始后悔；在美国，甚至有了“mob leader”（暴民首领）的提法。

和现代科技一样，中国在采纳西方的社会体制时必须对其思想基础和局限性有清楚的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环境污染和消费主义也同时到来。最近又出现了共享单车中的盲目投资和资源浪费。在大部分国民一包烟就能搞定一张选票的情况下，盲目引入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后果也不难想象。

陈独秀在一百年前大力倡导“赛先生”和“德先生”具有思想解放的进步意义。在科学和民主的深层问题被不断揭示的今天，我们再继续这么做未免太落后于时代。在一百年应对西方现代性冲击努力的基础上，中华文化正需要在深层上的创新。**中国目前的复兴不只是GDP的复兴，不只是科技的复兴，更重要的是深层文化的复兴。**

结语

北宋大儒张横渠如下的四句话后来成为众多中华哲人的座右铭。冯友兰把它们简称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张横渠正是中华文化第一次深层复兴的先驱。在第一次复兴中，中华哲人们在佛教多个世纪的冲击之后，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目前，在近两个世纪的基督教文化的冲击之后，我们需要做同样的努力。为此，“横渠四句”在当代更具意义。

从中华文化在汉代奠基，到宋代的第一次复兴，大约经历了一千年时间。从宋代的第一次复兴到如今，又过了一千年时间。在一个学英语比学汉语更热心，过圣诞节比过春节更起劲的时代，中华文化显然又进入了一个危难历史时期。然而，在自身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之后，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华文化现今的危难正是又一次千年复兴的前夜。

让我们为我们的想象插上翅膀，
去感受历史的雄壮！
让我们祝福我们最珍爱的这条燃烧的巨龙，
企盼它的又一次新生！



凤凰涅槃

一个古老的传说
化作
一个恒久的绵延，
一曲壮丽的诗篇。

日月不停地穿梭，
时势不断地交错。
为了穿越沧桑变换，
就注定要经受磨难。

燃烧吧，熊熊的烈火，
你除旧布新的神魔！
它的灵与肉都在腐烂，
又一次涅槃已在上演！

一只雏鸟正在蛋壳里酝酿，
即将开始新的歌唱……